

“政府全裸”不能人去政息

□秋风

四川巴中市白庙乡政府被网友称为“政府全裸第一例”。不过,它的公务开支明细表只在网上公布,而没有在当地公布,当地农民并不知道。(3月20日《新京报》)

应当说,不论以什么样的方式公开,白庙乡政府能全面公布公务开支明细表,都在财政民主的方向上迈出了可取一步。而且,今日乡村社会的年轻精英很多在外打工、经商,乡村政府的不少收入恰恰来自于他们。通过网络公开政府公务开支明细,让他们可以更方便地看到,这是财政民主的必要组成部分。但尽管如此,白庙乡政府还是应当在当地广泛张贴公务开支明细,毕竟,当地农民才是乡政府服务对象和监督主体。

从目前情况看,该乡公布公务开支明细,很可能是具有创新精神的乡镇官员的一次主动试验。该乡是四川省委党校“新农村建设研究中心”的实验基地,同时,该乡建立了独立网

站,这在全国比较罕见。还有,该网站首页上有这样一篇文章:《参与式预算是发展基层民主的新平台——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凡一席谈》。由此可以看出,该乡官员具有财政民主的创新意识。

但也可以看出,该乡的财政信息公开,主要源于官员在外部学者的启发、指导下,推进财政民主的自觉。由此也就可以理解,为什么它选择了在网上公开。反过来也可以说,这次的财政民主措施,来自当地民众的压力可能并不是很大,所以才会在网上公开而没在当地公布。

不管由于何种动力,这种预算民主、财政公开,对政府民众都是好事。现在的问题是,这样的试验怎样持久下去,又怎样扩展开来,不会遭遇人去政息的命运?

要做到这一点,目前主持试验的官员,就必须致力于把目前的做法制度化,尤其是把民众的参与制度化。一旦民众切实感受到财政民主的好处,习惯于参与式预算编制程序,他

们就会成为新制度的维护者。不管官员以后换成谁,这些新制度都可以持续。

那么,如何把财政民主试验制度化?关键的一步是发挥乡人大的作用。按照法律规定,乡人大的重要职责有“根据国家计划,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、文化事业和公共事业的建设计划;审查和批准本行政区域内的财政预算和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;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民政工作的实施计划”。所有这些工作都与预算直接相关。那么,关于财政的民主议事会,完全可以通过召开乡人大的方式进行。

只要这样的试验取得成功,其他地方的官员就可能模仿,受此启发的民众也可能给地方政府施加影响,财政民主制度的试验就可能慢慢扩展开。中国过去的大多数改革,最初就是如此推进的。但是,高层级政府也应对此予以支持,在必要时将其法定化。



难道我们真还要再吃十年“地沟油”？

□梅广 文/漫画

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何东平近日向媒体披露,目前我国每年返回餐桌的地沟油有200~300万吨。按照这个比例,你吃10顿饭,可能有1顿碰上的就是地沟油。(3月18日《重庆晚报》)

地沟油是什么?其前生不过是脏兮兮的下水道里那种暗淡浑浊、略呈红色的膏状物。而就是这个仅看字面就能令人翻肠倒胃的东西,竟然能成为被人用来烹炸煎炒的“食用油”,每年有数百万吨伴随着各式早点、菜肴,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我们当做美味佳肴吞进肚里,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而更令人震惊的是,按照何东平教授的估计,中国要彻底禁绝地沟油,可能还需要10年左右的时间。这意味着什么?它意味着,尽管我们知道地沟油危害身体健康,易诱发人体发生病变,其中某种致癌物质的毒性是砒霜的100倍,但遗憾的是,从目前来看对此可能毫无办法,被动的消费者不仅要继续吃下去,还要有一吃十年的心理准备。

面对猖獗的地沟油,难道我们真就束手无策吗?恐也未必。早在几年

前就有人建议,地沟油作为一种再生资源,政府应该采取统一收购、集中处理的方式,将其加工成生物柴油原料,变废为宝;即便没有加工转化能力,也要对餐厨垃圾做无害化处理,防止地沟油二次进入食品领域危害人们的健康。遗憾的是,或许是因为垃圾处理及再利用与地方GDP增长的关联性不大,不能直接为彰显政府部门的政绩加分,致使这个关系到广大百姓食品安全的问题,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,有些地方虽然也赶了一阵时髦,尝试过对餐饮机构的垃圾、“泔水油”进行无害化处理,不过几天的热闹劲一过,大多无疾而终。

要让人民有尊严地活着,最起码,应该做到不让人从下水道里讨吃的吧?在诸多关于食品安全的担忧中,地沟油无疑已成了老百姓的巨大心头之痛,从消费安全的角度上看,我们期待国家能尽快针对餐厨垃圾制定技术标准和管理法规,结束餐饮垃圾长期处于“无政府”状态的局面,更期待各级政府能将垃圾处理纳入职能部门的政绩考核目标,切实加强餐厨垃圾的回收管理,在对生活垃圾的处置和再利用方面承担主要责任,发挥主导作用,千万不要让还吃十年地沟油的预言成真。



城管晒工资

近日,一个名为《18 年城管还在靠 1532 元养家》的帖子在网上发表,透出城管沦为弱势群体的无奈。但持反对声的网友几乎呈现一边倒的局面。(3月18日《荆楚网》)

漫画/邝颀

有“不知道”局长,必有矿难

□杨耕身

小品《不差钱》那个著名的桥段被现实生活生生地演绎。网民这样改写发生在河南新密矿难现场的一幕:记者很无奈地说,“这个可以知道。”但“不知道”局长一脸无辜地回答,“这个我真不知道。”

“不知道”局长名叫王瑞林,新密市安监局局长。3月15日,新密东兴煤业公司发生火灾,25名矿工遇难。3月16日中午,新华社记者在新密矿难现场找到了王瑞林,问了他10多个关于矿难的问题,其中10个他大都表示“不知道”。

在公众舆论热衷于对一些“雷言雷语”极尽口诛笔伐之能事的时代,“不知道”局长像许多“雷人”官员一

样,拦都拦不住地跑进舆论场中,公演一出官场现形记,当真是一件让人相当无奈的事情。但是“不知道”局长既然勇于公开献演了,我们大约也只好欢迎之,围观之。不光“察其言,观其行”,而且也可以有些“眼看他起高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”的情境。倒也算获得了一些沉重之中的诙谐,荒诞之中的无谓。

身为安监局长,却对矿难事件及其救援情况以及前期的监管情况一概不知,那就真当得“尸位素餐”几个字了。有这样的安监局长,矿难或早或晚得发生,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。这也正是网友已经一针见血地指出:安监局官员“一问十不知”,不出事才怪。

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,安监局长口头禅一样的“不知道”,很可能只是

一种在事故发生后应对媒体的惯常“策略”,换言之,是另一种形式的“封口”。我们注意到,事发煤矿“六证”不全,属违法生产。这种情况何以出现?但不管是什么问题,安监局长一概“不知道”,显然不仅可以将矿难背后的问题遮掩起来,而且可以以不变应万变,立于不败之地。

在矿难频发的事发现场,一个叫做“不知道”的安监局长,正是一道奇异的风景,让人悲伤莫名。“3·15”东兴矿难发生后,河南新密市主管安全生产的副市长苏莹莹等人被免职。显然在这群人中,我们自然不怕再多一个安监局长的名字。但问题在于,我们如何能够承受再多一次的矿难?一个“一问十不知”的安监局长又能给中国的矿难治理带来什么提示?

民办学校的高尔夫球课惹谁了

□王攀

广东顺德一所有名的民办初中本学期引入一项被视为“贵族运动”的高尔夫球兴趣班,吸引全校20多名学生报名。这一做法引来争议,有家长认为,高尔夫球是适合有钱人玩的运动,普通人家的孩子学到这门技术,对未来发展作用不大。(3月19日《广州日报》)

我们往往把理性置于错误场合,然后表达错误的愤怒。“学校里只有学生没有‘富二代’”,“岂能不顾其他学生而对‘富二代’因‘财’施教”……当我们这样批评和指责时,恰恰忽视了广东顺德这所开设高尔夫球课的初中是一所民办学校,忽视了这所民办初中的学生多是有钱人的子弟,也

可以说就是“富二代”。

对于公办学校,在“贵族运动”高尔夫球还没有普及,在很多学生还上不起高尔夫球课的情况下,如果学校设置这样的课程,作为公办学校经费来源的纳税人,我们当然可以声讨。

可对于民办学校来讲,情况就不一样了,纳税人不是这些学校的奶娘,自然也管不了;而民办学校只要符合法律规定,我们就没有理由指责。

更何况,这所开设高尔夫球课的民办学校还是一所学生以“富二代”为主的学校。对于这些来自有钱家庭的孩子来讲,打高尔夫球不仅是他们父辈们经常玩的一项运动,也是他们未来要玩的一项运动。作为为学生从家庭到社会架起一道桥梁的学校来

讲,将他们未来踏入社会的需要纳入学校训练的范围之内,不仅是应该的,而且甚至是必须的。

中国的民办学校受到太多的限制,一是政策限制,中国教育政策并没有给民办学校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空间;二是社会限制,中国社会对民办学校还有深深的误解,当然有些误解来自于民办学校自身发展中暴露的各种问题。

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实践告诉我们,民办和公办任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都不可能做好。在我看来,我们应该给民办学校更多的自由。就像广东顺德这一民办初中开设高尔夫球课,我们不能拿目前公办学校的标准去衡量。由此,不妨问一句,民办学校的高尔夫球课惹谁了。

□段博

药价虚高、看不起病一直是百姓反映强烈的难点问题,与之相关的种种“治疗”方法也层出不穷。但是,地处陕北的子长县的改革却引起了广泛注目:通过大刀阔斧的医疗改革,使公立医院重新回归公益。一年下来,光药价和检查费用就为患者省下近600万元,药价下降幅度达到55%以上,真正使当地百姓从中获益。

子长县的做法其实并不复杂。通过改革药品招标方法,切断药厂、医药代表与医务人员间的利益链,原本允许医院15%的药价加成,由县财政统一补贴。改公立医院为全额拨款方式,政府投入大型医疗设备,以成本价为患者检查,一年为患者省下88万元的检查费用。改医院处方金额考核为处方数量考核,有效杜绝了“大处方”。

“子长医改”的实质,就是公立医院重新回归公益性。公立医院既然是公共财政投入设立,就应当为

普通群众的健康服务,而不是成为赚钱和赢利的工具。耐人寻味的是,在不少地方以种种理由为高额的药价和医疗收费辩护、叫苦的时候,作为一个财政收入仅为7亿元的子长县,却以实实在在的行动做到了公共医疗普惠于民。“子长医改”的经验表明,解决百姓看病贵、看病难,缺的并不是资金和方法,而是政府的社会责任和思路。

公共医疗的公益回归,体现的是公共财政的温暖回归。同样地处陕西省的神木县,推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制度,一年政府财政支出1.5亿元,当地百姓再也不会为看不起病发愁。在政府付出有形、有限的资金同时,消除了百姓因病返贫的隐患,赢得了巨大和无形的社会效益。

无论是“子长医改”,还是“神木模式”,着眼的都是百姓的切身利益,核心都是公共医疗的“公益”,而改革真正折射出的,实际是政府公共财政投入方向和公共服务理念的重要回归。